

“歹”字溯源*

邹 虎

(南京林业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8)

【摘要】“歹”字在近代汉语语料大量出现,其词义通常为“坏、恶”。对“歹”的相关认识,学界已有不少讨论。其产生途径,一般认为其源自口语。不过,关于“歹”字出现的历史时代、字形渊流及演变、语源归属等方面,由于证据尚有不足,仍纷纭众说。梳理各家观点,“歹”字产生时期定位于宋元之交当无疑议。关于“歹”字形来源的问题,本文基于汉字发展史视角,通过出土文献字形实例和字形勾连,指出“歹”字初形为“女”,并修正了其来自藏文的说法。在探究“歹”字音义上,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切入,认为其音义与契丹语相承,但语源实来自于汉语词“敌”,其语音大致经历 diaʔ-dia-dayi-dǎi 的演变过程。而“女”的形体来源,从文字特征及相关字形分析,推测其可能与契丹小字存在关联。

【关键词】“歹”;时代;形体;音义

【中图分类号】H12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442(2026)03-0133-10

doi: 10.19888/j.issn.1001-5442.2026.03.014

近代汉字中有一个“歹”字形体,其词义为“坏、恶”,与“好”义相对。从产生途径来看,“歹”源自口语尚无异议。不过,关于“歹”字出现的历史时代、形体演变轨迹、语源归属等方面,由于证据不够充分,诸说聚讼,多个问题仍旧存疑,有必要做进一步讨论。

一 “歹”字产生时代

1.1 “歹”字宋元说与唐五代说的争论

关于“歹”字产生时代的争论,焦点集中于宋元之交抑或宋代以前。综合各家所论,多数学者持前一观点,从立论时间上看,后者是对前说的质疑和推覆。最早言及“歹”字形体与时代者,是清人翟灏,其《通俗篇·品目》下有云:“歹,《字汇》:‘多改切,好之反也。’《字学订讹》:‘俗误作歹。歹,牙葛切,残骨也,与歹不同。按:此字宋以前未见用之,惟《元典章》有‘管匠造作,或好或歹’及‘送纳鹰鹞如歹,徒教耗费支应’等语。”崔氏以为“歹(歹)”字宋以前未见,当始于元。近现代历史学家李思纯(1957:26)提出:“汉语谓不良为‘恶’为‘劣’为‘坏’,无所谓‘歹’,现代汉语中,谓恶人为歹人,恶事为歹事,善恶为好歹,已为习见的成语,这在南宋末期以前,是没有的。”并认为“歹”出于蒙古语。徐复(1990:29)考订其形音义,明确提出“歹字制作之年代,至迟不出公元 1260 年,早当在成吉思汗后王时,此可断言者也”。刘坚(2005:133)从词语产生时期上断定“‘好歹’肯定不会出现于宋代”。在“歹”字时代及来源的问题上,蒋冀骋(2005)、裘锡圭(2013)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近代北方汉语语言接触演变研究”(23&ZD315),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基于语料库的宋元碑刻俗字整理与研究”(23BYY014)。

皆从徐说,黄征、张涌泉(1997)从文字应用的角度出发,亦认同其当出现于宋元之际。

随后,徐时仪(1993)对“歹”字产生于宋元之交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其形体早在唐末五代即有表达“恶劣、坏”的意义。徐说依据的是两则晚唐五代时期的敦煌语料。一为《敦煌变文集·父母恩重经讲经文》:“释迦尊,留教敕,看取经文须审的;若是长行五逆歹人,这身万计应难觅。”另为《维摩诘经讲经文》:“啼树晚莺同助哭,语檐秋燕共添哀。分襟顷刻又惆怅,待礼牟尼对宝台。且希居士好调和,不得因循纵病歹。蓦被命终难脱免,息^①然身教大娄罗。”《汉语大词典》《唐五代语言词典》即纳入此结论和语例。杨琳(2010)同其说,同样援引此二例以证唐末五代时期已有“好歹”之“歹”,否定其来自蒙古语的说法。受《汉语大词典》的权威性影响,这一结论亦被不少研究者援引。

1.2 唐五代说立论依据可靠性问题

不过,《敦煌变文集》这两则语料中“歹”字的确定性问题随即受到质疑。《父母恩重经讲经文》中“歹”字原卷 P.2418 作,黄征、张涌泉(1997:995)释为“支”,通“之”。蒋冀骋(2005:255-256)亦校作“支”,并引上文“此者并是辜恩负德五逆之人”以为佐证,“五逆支人”即“五逆之人”。杨琳(2010:117)否定此说,认为“支”“之”中古音有别,未见通假之例,故主张“歹”字不误。《维摩诘经讲经文》中“歹”字原卷 S.4571 作,黄征、张涌泉(1997:805)释为“多”,蒋冀骋同之。任中敏(2014:1161)认为其字可能是“多”的形讹,但又认为作“歹”文意更谐,自相抵牾,且对“歹”字读音的解释流于臆断。杨琳则认为其字为“歹”字,且“歹”字押韵,“多”不入韵。裘锡圭(2013:113)否定杨说,认为显然不像“歹”,而作“歹”则与韵调不合。

今按:以作“支”为是。敦煌文献中“支”字常见,其俗书或与形近似。俗写中竖笔与短横合笔变为一撇,末尾通常增一点。如 S.2073《庐山远公话》:“四~~支~~沉重,百骨酸疼;去天渐远,去地应近。夜卧床枕,千转万回,是时不能。”黄征(2005:551)录其为“支”,不误。此处“支”通“肢”,即指肢体。与,除末尾点笔外,仅横与长撇连接之微别。S.612V《占书》:“其十二支六阴六阳。”其字作,横与撇相离。杨说认为“之”与“支”中古音有别,未见通假之用。其实,“之”与“支”章母双声,中古韵母旁转迭韵,音近可通。影上海涵芬楼藏宋刊本《六臣注文选》陈琳《檄吴将校部曲文》:“而建、约之属,皆为鲸鲵。”“之”字下注曰:“五臣作支。”《续四部丛刊》本《文选李善注》“而建、约之属”条下清人胡克家考异:“何校‘之’改‘支’,茶陵本云‘五臣作支’,袁本云‘善作之’。案:详文义,当作‘支’,或各本所见传写误为之也。”“支属”^②即亲属,句意指韩约、宋建的宗支尽遭杀戮。正因“之”“支”中古音可通,所以产生异本,可证杨说非是。蒋冀骋认为“之”“支”五代时已同音,其实“之”“支”《广韵》皆属章母止摄平声,同为开口三等全清字,然“之”归“之”韵,“支”归“支”韵,韵目有别,属音近,至元代《中原音韵》,二者则完全同音。

依据字形、语体规则及语境综合考察, S.4571 之乃“多”字无疑。“多”作为常用词,敦煌文献习见,除通行正字外,另有多种俗体。或作“丑”,敦研 223《大智度论》卷八十五“菩萨功德甚多”其字作;“多”上下皆简省,敦研 235《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卷九“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其作;上部省简, P.2398《太玄真一本际经圣行品》卷三“其中众生,多造恶行”其作;上部一笔连写, S.6825V 想尔注《老子道经》卷上“多者何伤”作, P.2319《大目乾运冥间救母变文》“如来神力移山海,一切众生多爱恋”作;上部连写并与下部共笔, P.2418《父母恩重经讲经文》“纵愚痴,多抗拒,父母诫真撲匙助”其作,同卷另“皆惭母乳多恩德,尽感怀耽足煞怜”作。、、与《维摩诘经讲经文》之形皆极近。“多”上部省为一点, P.2418《父母恩重经讲经文》

“灾障年年无一点,出入日日有多般”作,此形与“歹”相似,然据文意,则显非“歹”字。《维摩诘经讲经文》中,关于“歹”的完整上下文语境是:“啼树晚莺同助哭,语檐秋燕共添哀。分襟顷刻又惆怅,待礼牟尼对宝台。且希居士好调和,不得因循纵病歹。蓦被命终难脱免,息然身教大娄罗。煎汤幸有黄金铍,熬药宁见白玉锅。善恶多般需摄治,莫教迴迴见蹉跎。况当时景已秋深,刮地蟬齐出晚林。露缀晚花千滴玉,菊摇寒砌一蓂金。清风冷淡牵愁思,黄叶凋零打病心。居士切须勤摄治,莫教死相便来侵。”杨文认为“歹”与其前之“裁、徘、催、哀、台”押韵,“多”字则不入韵。细审之,此说难以信从。蒋冀骋(2005)在押韵和句意分析上已有详细讨论^③,此不赘言。

综上所述,相关学者认为“歹”字产生于唐末五代的观点,其所依据的敦煌文献字例材料都不可靠,结论自然失据。徐文另举《景宋残本五代史平话》(又称《新编五代史平话》)有关“歹”字语例,认为至少在元代以前,“歹”这个词已在汉语中产生。然《五代史平话》版刻年代本身即有争议,根据学者讨论,其更有可能刊编于元代^④。遍检唐宋实物文字文本,包括碑刻、写本、版刻语料,均未见“歹”字。因此,“歹”字出现于宋代之前的说法并不成立,从现有证据来看,其产生于宋元之际的观点更准确可靠。

二 “歹”字形体来源

2.1 “歹”字藏文说及其争论

最早探讨“歹”字形源的是徐复。他先后撰文《歹字源出藏文说》《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认为“歹”字形体源自藏文字母。徐文中说道:“余近考知歹字形体,当出于藏文。藏文三十字母,每四字为一组,其第三组第一字为,音如德矮切(以国音表之,则为ㄉㄞˇ),其音与𣎵相近。又其形体,元刊本《南村辍耕录》卷一:蒙古七十二种,有札刺儿歹,忽神忙兀歹歹,瓮吉刺歹,别刺歹等,字皆作歹,与藏文之形体亦合。因知今体作歹者,又笔势之变也。至元人造字,何以源出藏文?今按蒙古族初未有文字,元世祖中统元年,命国师八思巴制蒙古新字,其形即本于藏文字母,则歹字谓出自番僧所造,盖不为臆测也。”(徐复 1990:26-27)李思纯赞同其说。杨琳则认为此说过于牵强,理由是“”与“歹”差别较大,读音上“”读 ta,与“歹”(多改切)仅声母相同。需要说明的是,徐文所对比字形是“歹”,杨氏误以“歹”为参照。

这里有必要先对“歹”“歹”进行梳理。“歹”本是“𣎵”的省变。《说文·𣎵部》:“𣎵,列骨之残也。”𣎵隶定作“𣎵”,隶变则为“歹”,成为通用写法,本义是剔肉后的残骨。《广韵·曷韵》:“𣎵,《说文》曰:‘列骨之残也。’凡从𣎵者今亦作歹。”中古“歹”作五割切,音 è。“𣎵(歹)”一般不单用,通常作为组字构件充当形声字的意符或音符。中古楷书部件“𣎵”除作“歹”外,另有两种主要变体。一是“𣎵”,即短撇与点连笔,如“殍”东汉《张迁碑》作^⑤(臧克和2011),“殍”唐《寇堽墓志》作,“殍”唐《龙泉记碑》作。二作“𣎵”,横折省变为撇,更为通行,如“殍”唐《赵留四墓志》作,“殍”北魏《王基墓志》作,“殍”北魏《元悌墓志》作,“殍”北魏《檀宾墓志》作,“殍”S.318《洞渊神咒经·斩鬼品》作 (黄征 2005:482)等,字例甚多。也就是说,中古“歹”“𣎵”“𣎵”互为异体,皆源自𣎵(𣎵)。

近代“歹”字产生之前,最初由“𣎵”记其音。“𣎵”字出现于宋,本义阙失,《玉篇·角部》:“𣎵,多改切。”^⑥义未详。《玉篇》另有“𣎵”字,作“多改切,角心也”。《字汇》以“𣎵”为“𣎵”的异体,《正字通》则以“𣎵”为“𣎵”之讹,并附“《字学三正》以‘𣎵’为‘好歹’之‘歹’”。《康熙字典·角部》:“𣎵,《玉篇》多改切,音歹,义阙。《字汇》‘同𣎵’。又人名,《宋史》有元帅宋都𣎵,《辽史》有文班吏萧𣎵里,《元史》有断事官术忽𣎵。又《字学三正》:‘𣎵,与好歹之歹同。’”可知《正字通》《康熙字典》所载“好歹”之“歹”音 dǎi,与“𣎵”可换用。但今《四库未收书辑刊》明万历刻本《字

学三正》惟“歹”字条下云：“歹，非好𠂔字。”未见二字书所引此条。从内容上看，两处恰相抵牾，颇难解会。据体例，《字学三正》此处是以“体音并异误用字”列举，且对比字形往往形似，“歹”（音è）与“𠂔”音异自不待言，然何以形近？若《正字通》《康熙字典》所引自有所本，则此处之“𠂔”实当为“歹”。《字汇·歹部》：“歹，多改切，戴上声，好之反也，悖德逆行曰歹，俗作歹，误。”《正字通·歹部》：“歹，旧注‘多改切，戴上声，好之反也，悖德逆行曰歹，俗作歹，误。’按《字彙》歹打拐切，歹为俗增，非歹、歹分为二。旧注歹同占，凡从歹者皆从歹，歹俗作歹，误。不知好歹之歹俗作歹，歹非同占，歹误为歹也。”也就是说，表示“悖德逆行”义的是“歹”字，“歹”“歹”形近，故俗写“歹”混作“歹”。“歹”即作为徐复所论藏汉对文的汉字参照。

2.2 “𠂔”“歹”“歹”辨正

若以“歹”为对比参照物，其与“𠂔”明显有别。裘锡圭（2013:113）认为：“这个字在古书里的较早写法是𠂔^⑦，跟上举藏文字母（𠂔）很接近，后来变形作‘歹’，最后才变得跟‘死’‘残’等字的左旁混而不分。”今按，此说还有继续讨论的余地。首先，若“𠂔”为近代“歹”字初形，明清字书皆以“歹”为正体，俗体仅收“歹”或“歹”，不见“𠂔”形，令人费解。《四部丛刊三编》元抄本《元朝秘史》中“歹”字习见，多用作人名，形体相对稳定，作“歹”，如𠂔、𠂔，即明清字书所载正字，与“歹”“歹”并不相混，可判断其当是较早的抄本。形成对比的是，书中以残骨之“歹”作组字部件时，其异体重出，“歹”“歹”“歹”往往混同，如“列”即有𠂔、𠂔、𠂔等形，彼此互见。因此，字书未将𠂔作为近代“歹”字俗体，并非因为“𠂔”使用率低，导致被“歹”“歹”替代，上举“列”字已证三者可共时互用。合理的解释是，“𠂔”作为“歹”的简俗体使用，“歹”另与“歹”形近相混。其次，若近代“歹”字三形的演变序列是由“歹”变作“歹”，再变作“歹”，“歹”仅为过渡形体，既非初文，在书写简易度和传播上也不及“歹”，何以作为规范正字通行一时？从逻辑上看，“歹”既非最简，也非最规范，缺乏作为正字的充分条件。另外，裘文所提出的𠂔在宋元之际与“歹”“歹”的演变和混同关系也不准确，据前文所论，三者中古即已混用，与藏文无必然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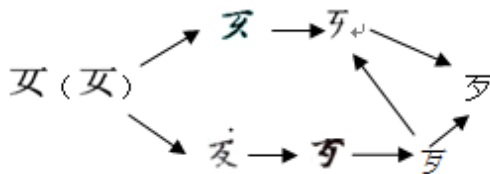
从形体来看，“𠂔”与“𠂔”确然形似，然裘文所列“古书”字例为《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元刊本《南村辍耕录》卷一，若其说不误，那么同本《南村辍耕录》他处、与此刊本年代相近的其它古籍，以及更早时期的文献中好歹之“歹”应皆当或近似于“𠂔”。情况并非如此。《四部丛刊初编》元至正刊本《柳待制文集》卷十一“因与万户燕只吉歹荡平大洪山黄仙洞诸险隘”其字作𠂔，即“歹”。《南村辍耕录》为元末建阳刻本，书序作于至正丙午（1366），刊刻年份最早不过此年。而《柳待制文集》为至正十年（1350）刻本，时代在前，文中已见“歹”字。因此，仅因“𠂔”更近于藏文“𠂔”，便将“歹”归结为“𠂔”的形变的说法并不十分可信，确定“𠂔”与“歹”产生的先后有赖于更为充分的证据证明。

2.3 “歹”形演变梳理

由于词义产生不久，字形尚不稳定，元刻本中“歹”字形体多变。《四部丛刊初编》元刊本《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二十五“亦吉列歹”其字作𠂔；高丽翻元刊本《皇元风雅》前集卷二“怜吉歹”其作𠂔；《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前集“方信道相思是歹信候害的”其作𠂔，同卷九“忙古歹”其作𠂔，即“歹”，同卷八“出削个好歹”其作𠂔，即“歹”；《静修先生文集》卷十六“速不歹”其作𠂔。明代以后，“歹”通常作“歹”“歹”“歹”“歹”四形，与字书所载相合。但俗书中也存在不少异写，如明弘治刊本《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就有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等。通过排比大量历时字形，可以确定的是，近代词语“歹”之初文并不作“歹”字，也可说明“歹”产生于中古的论点建立在错误的认识上。既然其字最初并不写作“歹”，学者们以其元代才出现的俗体“歹”字放诸中古敦煌文献来求

取词的音义和时代溯源,其结论便难以令人信服。

限于传世古籍复杂的版本流传,在数量有限且刊刻年代难以厘清的元刊本中考察“歹”字形源及变异轨迹并非易事,而出土文献特别是碑刻年代明确,写定上石后一般未作翻改,保存字形原貌,为解决“歹”字产生时代、形源及演变提供了关键线索。元代碑刻^⑧“歹”字有多处用例。蒙古宪宗元年(1251)《成吉思汗手诏累朝崇道碑》:“我前时已有圣旨文字与你来,教你天下应有底出家善人都管着者,好底歹底,丘神仙你就便理会,只你识者。”这是目前所见“歹”字的最早用例,时代处宋元之交,出自口语语料,词义与“好”相对,字形作𠂔^⑨,与藏文绝不相类。入元以后,碑刻“歹”字承绪其形。至元三十年(1293)《利津县新修庙学记碑》其字作𠂔,至大三年(1310)《紫微宫圣旨碑》作𠂔,又《重修神泉里藏山神庙记》作𠂔,延祐二年(1315)《玉泉观碑》其作𠂔,延祐四年(1317)《龙安山塔铭记》作𠂔,至顺三年(1332)《元西行记碣》其作𠂔,至正元年(1341)《檀氏先茔碑》其作𠂔,至正二年(1342)《御香代祀碑》作𠂔。上述形体结构稳定,趋于一致,可隶定作“𠂔”,是元碑中“歹”字的主流写法。上文所举明刊本《秋涧先生大全文集》诸形即与此承贯,或稍有变异。元代中后期,“𠂔”出现歧变,产生异体。延祐七年(1320)《显庆寺碑》其字作𠂔,末笔由撇变为横折,实“歹”之初形。至正六年(1346)《御香代祀碑》其字作𠂔,已与“歹”近似,同篇另有字形作𠂔,与前代之“歹”混同。至正七年(1347)《御香代祀碑》其字作𠂔,亦为“歹”。上述各例呈现元碑中“歹”字面貌,暂未见其异体“𠂔”,其形当晚出。除前举版刻字形外,元代抄本有其形,《元刊杂剧三十种·新编岳孔目借铁拐李还魂》其字作𠂔(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藏版:1998)。由“𠂔”到“𠂔”,过渡形体便是𠂔,三者处于形变的同一链条。“𠂔”第二笔被撇截断,右部变点则为𠂔,𠂔省略末尾一点便作“𠂔”。基于此,我们可以图示标明近代“歹”字形源及变异轨迹,即:



元代后期,“歹”之变体渐为主流,“𠂔”形少见,为明清字书失载。另外,关于“歹”字在汉语中的发展情况,李思纯(1957:35)依其时代,认为:“由绍定至南宋亡(1276),为藏文字母译写歹字,并混入汉文汉语的时期。由元初至明初(1277—1368),将近百年,为歹字转写成汉语通行的时期,流行迄今。”通过上述论证及文献材料证据,其论多有疏失。除“歹”非来自藏文外,时代上,元朝建立前,“歹”在汉语中当已通行(《成吉思汗手诏累朝崇道碑》文为官方令旨,遣词用语当为民间通识),字形亦相对稳定。

三 “歹”音义溯源

3.1 “歹”语源归属争论

“歹”的音义来源,目前仍有争议。学界一般认为“歹”来自蒙古语,这一观点由李思纯(1957:26)首次提出,得到广泛认同。此论主要依据的是两则南宋末期的汉文语料。南宋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鞑鞑人言及饥寒艰苦者谓之𠂔。”文后注云:“𠂔者,不好之谓。”“𠂔”即“歹”,音同换用。然《黑鞑事略》另载:“予之则曰捺杀因,鞑语好也。不予则曰冒乌,鞑语不好也。”似“𠂔”与“冒乌”皆有“不好”之义。另外,《四部丛刊》本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十三《指南录》之《上江难诗序》:“至七里江,忽有巡者喝云:‘是何船?’梢答以河鲀船。巡者大呼云:‘歹船!’歹者,北以是为反侧奸细之称。”(此处二“歹”刊本均作𠂔,为其初形。)李文认为:“试

看彭大雅、徐霆说到𦍋字,必定解释为‘不好之谓’,文天祥说到‘歹’字,必定解释‘北以是为反侧奸细之称。’可证在南宋末期以前,汉语决无此字义。文天祥《指南录》中称蒙古皆为‘北’,可证此字是出于蒙古语,而非其他民族语。”

方龄贵(2004:242)对“歹”出自蒙古语的观点提出质疑,认为:“按蒙古语训为‘不好’的本有一字,《元朝秘史》第一一一节作‘卯兀’,第一八九、一九六节作‘卯危’,第二四五节作‘卯温’,傍译均作‘歹’,《华夷译语》通用门‘歹’作‘卯温’,《诏札阿失里》条、《失列门书》条又作‘卯兀’,丙种本《华夷译语》通用门‘歹’作‘毛温’,《武备志》引《蓟门防御考》‘歹’作‘毛’,包培《木卡迪玛特·阿勒阿塔布蒙古语辞典》附录《伊本木罕纳语汇》所收 ma'u 训为吝啬的,微弱的,暗淡的,可恶的,该死的,万恶的,偕行社《蒙古语大辞典》第一三二五页有 magu,训为‘恶的’,‘丑’,都应该是此语。汉文著录和字书中以‘歹’字来训‘卯兀’(卯危·卯温、毛、毛温同),这是很可注意的。倘说‘歹’是蒙古语,那么何以用蒙语训蒙语,殊不可解。”徐文堪(1993:75-76)赞同其说,认为将“歹”看作是借自蒙古语的外来词根据并不充分。

今按,从现有的观点来看,“歹”词义来自蒙古语的说法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尽管方文质疑“以蒙语训蒙语”的合理性,但对李文所援引的两则语料中所涉及的“𦍋语”“北”未予置评,也并未进一步揭示其确切来源。实际上,外来词融入本民族语后,其音义和用法逐渐被接受,当其用作常用词且能够进一步发展出新的词义,其外来词身份模糊,时人难以分辨,用汉化的词去解释原民族语词也就不足为奇了。如蒙古语中表示驿站的词汉字记音作“札木”“札米”,汉语对译为“站”。《元朝秘史》续二(参乌兰 2012:397-398)又以“站”对译蒙古语“站”,即是以蒙语训蒙语。因此,蒙语训蒙语的非理性现象并不能排除“歹”源自蒙古语的可能性。

3.2 “歹”在蒙语中的音义及其发展

根据《黑鞑事略》中的两则记录,蒙语中表达“不好”之义的词似谓“歹”,又谓“冒乌”。《指南录》另载“歹”为“奸逆”之称。这一用法还有类似例证。南宋郑思肖《心史·大义略叙》云:“歹者,指其异心,亦恶逆之称。”指出“歹”含“异心”“恶逆”义。关于“歹”在文献中出现的两种不用含义,李思纯(1957:26)认为,蒙古语“不好”的意义,应当是“卯危”“反逆”的意义,应当是“歹亦真”^⑩,二字各有本义,不能混为一谈。汉人不能分别,就泛称凡不好皆为歹,把蒙古语义混淆了。

今按,这一观点大致可信。蒙语中表“不好”义的是“卯温”“卯兀”“卯危”“冒乌”等一组同音义的异形词。其音义稳定,蒙语中使用至今。《蒙汉词典》(1999:806)收录 mayu 一词,发音为 [mo:],义项为“坏的,恶的,劣的,不好的”等,即为“卯温”组音译词的来源。至于“歹”所含的“不好”义,我们可重新审视《黑鞑事略》此句注解用语的起因。《黑鞑事略》此处原文完整语境为:“见鞑人每闻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躲避状。其赏罚,则俗以任事为当然,而不敢以为功,其相与告诫,每曰:‘其主遣我火里去,或水里去,则与之去,言及饥寒艰苦者谓之𦍋。’”据上下文意,此处“𦍋”实“悖逆”义,表违主之命,其注“不好之谓”乃随文训释。受此影响,“歹”的“不好”义在汉语中传播并广为接受,成为其常用义。

不过,“歹”在十三世纪蒙古语中基本义,并非“异心”“反逆”,而是指“敌人”。《元朝秘史》中多见使用,汉语音译作“歹因”“答因”“答亦”“歹亦孙”“答因突儿”“歹亦孙突儿”等。以下试举数例说明^⑪。

- (1) 音译：帖木只 泥 罕 孛鲁阿速 巴 斡 答因突儿 阿斤赤（《元朝秘史》卷三）
旁译：人名 行 皇帝 做汉 俺 多 敌 行 头 哨
翻译：帖木只（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做前哨。
- (2) 音译：额朵额 巴撒 歹亦孙突儿 失罕 歹亦孙 木 古 孛鲁宜 客额额（《元朝秘史》卷四）
旁译：如今 再 敌 行 挨着 敌 他每也 做了 说了
翻译：倒倚着敌人，又做了敌人。
- (3) 音译：答因 阿亦石（《元朝秘史》卷四）
旁译：敌 来也
翻译：敌人将至。
- (4) 音译：出刺麻你出棍 先秃 都周 摆亦浑 歹因 蔑朵脱刺温（《元朝秘史》卷四）
旁译：赤裸 相抗拒着 立着 敌人 里面
翻译：（者蔑）乃裸身径去敌人营内。
- (5) 音译：斡 歹亦孙突儿 哈兀鲁 舍秃 你客捏 哈兀鲁牙（《元朝秘史》卷五）
旁译：多 敌 行 征 时 一同 一处 征咱
翻译：多敌人处剿捕时，一同剿捕。

上述各例音译形式对应的汉语义皆为“敌人”。“歹因”“答因”“答亦”的发音，各词典录作 *dain*，根据 Ferdinand D Lessing (1960:222)，其为名词，义为“战争”“敌意”“敌对”。“歹亦孙”发音作 *daisun*，同为名词，义为“敌人”“威胁”。在实际使用中，*dain* 与 *daisun* 皆有“敌人”“敌对”义。从词形上看，两者以 *dai-* 作为共有词干，有理由认为，这两个词当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变体。“*n*”与“*sun*”作为不同的形式标记，功能上有所差别。据焦其戴·吉仁尼格 (1987:49) 研究，蒙古语中后缀 *-n* 为名词的复数形式，限于用在指人的名词后，如 *malči-malčín*（牧民）、*manglai-manglan*（先锋）。*sun* 作为后缀附加在词根或词干后表示单数，如 *hubča-hubčasun*（衣服）。凯琳 (2022:68) 认为，名词后接 *sun* 派生的名词，多指与年龄、亲属、职业等相关的人物称谓。“歹亦孙突儿”音为 *daisun-dur*，根据清格尔泰 (1991:152)，*dur* 为名词的向位格形式，表示“于 / 在 / 对……”。

尚需说明的是，Ferdinand D Lessing *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是一部记录现代蒙古语常用词汇的词典，由于语音和词义的发展演变，未必能准确反映中世纪蒙古语的面貌。*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记录 *dain* 含有的“战争”义，《元代秘史》中并无用例，当是词义发展引申的结果，这一义项也被现代蒙古语所继承。如内蒙古阿拉善地区发 [dæ:n] 音表示“战争”，用 [dæ:san] 指“敌人”，发音近似于 *dain* 及 *daisun*。（见孙竹 1990:192）不过，我们仍然能从明代阿拉伯人的记录中找到相关的词汇记载。在《汉译简编穆卡迪玛特蒙古语词典》(2022:31) 中收录有 *dain* 一词，义为“敌，仇敌”，与上文所列《元朝秘史》各例中的用法相符。从“仇敌”到“反为仇敌”，词义引申，又产生“反逆、奸逆”义。《元朝秘史》卷八：“先投降的蔑儿乞，在老营内反了。”此处“反”字，蒙语为“歹亦只”。同卷“成吉思说教他在一处他又反”，“反”对应蒙语“歹亦真”。其卷六：“同帖木真反出的达达。”此“反”蒙语为“歹亦只”。*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收录动词 *daici*，义为“敌意、敌对、发动战争”，发音与“歹亦只”极近；另收录 *daicin*，发音近于“歹亦真”，义为“战斗、好战的”。无论 *daici* 抑或 *daicin*，皆是以 *dai-* 作为词干的变体形式。由 *dain* 到 *daici*，名词发展为动词，是“歹”含“反逆”义的语言内部动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歹”的词义发展脉络进行如下梳理：“歹”本义为“敌人、仇敌”，词义引申出“奸逆、悖逆”义，两者成为中世纪蒙古语“歹”的常用义。其引申义经汉人的模糊性理

解,笼统译为“不好”,此义渐被汉语吸收,并不断扩大其用法。“歹”由本义出发,另引申出“敌对、敌意”,由此发展出“战争、战斗”义,成为现代蒙古语的常用义。

蒙古语作为阿尔泰语系诸语言之一,发达的附加形式及其多样的功能是其典型特征。前苏联语言学家 H.A. 巴斯卡科夫认为,阿尔泰诸语的特征是用粘着成分来进行鲜明的表达,词语的结构十分复杂。阿尔泰诸语言中的词从其词法结构的角度来说,并非仅仅由词根与词缀所构成,而是一种由词素与它所固有的词汇、语法意义相结合的复杂组合。并以突厥语为例,将词中的构词和词形变化的词缀分为四种,即词根、词汇-语法方面的构词词缀、标志构词语法功能的词缀及词形变化词缀。(参 W.科特维奇 2003:8) 这种对构词和词形变化的认识与分类同样适用于蒙古语,围绕词根 dai- 构成的词汇、语法相互区别的多种形式即为其显著体现。

3.3 “歹”音义溯源

关于“歹”的发音,字典通常记录其词形为 *dain*。ai 的二合元音结构作为蒙古语语音发展的重要标志,揭示 *dain* 可能并非早期蒙古语的实际语音。根据现有的研究,目前的共识是,蒙古语二合元音的形成均来自 VCV 序列,即 V+y/g/b+i 序列。常见的演变轨迹是辅音 y/g/b 变为 y,形成 Vyi 序列,再演变为 Vi。(参哈斯其木格 2024:38-40) 因此,早期蒙古语中表示“敌人”的常用词当是 *dayi*,发音近于“答亦”。后附加复数后缀 n,固化为 *dayin*,即“答因”。

蒙古语“歹”的音义到底如何产生,其来源当于何处? 我们似可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寻找些许眉目。对中世纪蒙古语语音、词汇影响颇深的契丹语为揭示“歹”音义的来源提供了重要线索。我们注意到,契丹语在表达“敌”义时,契丹小字写作𐰽𐰺𐰍。如契丹小字碑《撒懒·室鲁太师墓志碑》中𐰽𐰺𐰍及𐰽𐰺𐰍,整理者译为“大敌”(见清格尔泰等 2017:1383);《耶律抄只郎君墓志铭》中𐰽𐰺𐰍,整理者译为“敌军”(清格尔泰等 2017:1354)。其中𐰽是表示复数的附加成分,清格尔泰等(1985:153)拟音为 [t] 或 [tʰ]^①,𐰺拟音为 [ia] (清格尔泰等 1985:108),则𐰽𐰺𐰍的读音为 [tia] 或 [tʰia]。根据“敌”在中世纪蒙古语中的音读为 *dayi*,声母不送气,推测其契丹语发音当为 *dia*。*dia* 与 *dayi* 音近义同,有明显的同源关系。契丹语 *dia* 作为外来词传入蒙古,语音经过适当调整,以满足蒙古语元音和谐律的要求。

近些年来,随着对契丹文字及语音研究的不断深入,契丹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观点成为国内外学者的共识。契丹的族属,学界一般认为,契丹与鲜卑在族属上有渊源关系,鲜卑语是契丹语的祖语。关于鲜卑语的系属,法国学者伯希和在《吐谷浑为蒙古语系人种说》一文中认定鲜卑语属于蒙古语族。(参孙伯君、聂鸿音 2008:15) 拉施特(1983:227) 同样认为契丹语与蒙古语有渊源关系。他在《史集》中说:“所有的(哈喇契丹)部落都是游牧民,与蒙古游牧民有亲属关系。他们的语言、外貌和风俗习惯彼此相似。”契丹语与蒙古语间有大量音义相合或相近的语词,有共同的语源,不烦举例。(可参齐木德道尔吉 2002:136-138) 公元十世纪初,契丹在中国北部建立统一政权,国号“辽”,与北宋对峙。辽国的建立与发展,促成了契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迅速崛起,同时对蒙古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开发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契丹语言文字对外流传的范围很广,首当其冲便是原始落后的蒙古。而在整个辽金时代,蒙古语的汉语借词往往是通过契丹、女真语进入蒙古语的。

尤值得注意的是,契丹语“敌”的发音 *dia*,又与汉语高度近似。“敌”,《广韵》归梗摄定母锡韵,开口四等全浊入声,各家通常拟音作 [dʰiek]。根据傅林(2013:98),辽代汉语浊声清化,中古入声韵尾已先后脱落,其顺序为“t-k-p”。“敌”浊音清化,变为不送气清音,在辽代汉语后期脱落韵尾“k”,发音近于 [die]。现代汉语方言中,山西太原、忻州,上海崇明皆音“敌”为 [diaʔ](参

李荣 2002:5551-5552),舌位较低,声门闭塞,保留一定古音成分。[diəʔ]与dia发音极近,我们有理由推测,契丹语“敌”的音义可能借自汉语,从汉语到蒙古语发音,大致经历diəʔ-dia-dayi-dai演变过程。汉语“敌”音义传入契丹后,又在蒙古语中发展,音义皆发生变异,返借回汉语变为“歹”。

我们再回顾“歹”字初形“女”,与其说其形体与藏族字母有关,毋宁说其与契丹小字在某种程度上更为贴合。契丹小字原字(又称字母)中有诸形体如𐰃(书写词干,音ur)、𐰄(领格附加成分,音un)、𐰅(音义未详)、𐰆(音义未详)等,笔形与“女”近似,推测“女”的形体来源可能是契丹小字。学界一般认为,契丹小字是一种音节兼辅音文字,具备字形和字音,而且通过原字(或字母)的组合形成字义。原字的基本笔形如同汉字,绝大部分笔画与汉字相同。契丹大字源于汉字,而大字与小字又有明显的继承关系。契丹创制者从大字中选取许多简化的字母作为小字的原字,同时利用汉字的偏旁部首另外创制了一批原字字形。(参清格尔泰等 2017:84-90)“𐰇”笔画同于汉字,但并非汉字,其字形结构与组合已经过契丹人的改造。尽管尚未在数量有限的契丹文献中觅得其形,但从造字原理及音义来源综合分析,蒙古人可能将“歹”字音义及其形体一并借入。

四 结语

近代汉语词“歹”产生时代的问题,研究者受习见的字形束缚,在时代认定上出现误识,词义的梳理上难免疏漏。而在字形和词义的溯源上,理解认识呈现缠绕的局面,认为其字形来自藏文者,一般也认可其词义出自蒙古语的观点。以近代实物文字为依据,定位字形在汉字发展链条中的时代坐标,梳理字形混同、变异脉络,能够为探求“歹”字形源提供重要线索。“歹”字产生的时代,定位于宋元之交已无疑议。关于“歹”字形来源的问题,本文基于汉字发展史视角,通过出土文献字形实例和形体勾连,指出“歹”字初形为“女”,并修正了其来自藏文的说法。在探究“歹”字音义上,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切入,认为其蒙古语音义与契丹语相承,但语源实来自于汉语词“敌”,其语音大致经历diəʔ-dia-dayi-dai的演变过程。而“女”的形体来源,从文字特征及相关字形梳理,推测其与契丹小字存在关联。

附注:

- ①此处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68页)作“忽”,是。
- ②《通假大字典》(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9页)以为“支”“之”均通“枝”,“枝属”义旁系亲属,此处于意未达,尚不足取。
- ③根据蒋冀骋(2005:255),“裁、徘、催、哀、台”皆为平声韵脚,“歹”为仄声,有悖押韵定则。另外,此段四句换韵,前八句两分段皆首句入韵,“裁、徘、催、哀、台”相押后换韵,𐰇实与之后之“罗、锅、跼”相押,而“林、金、心、侵”则另换韵。“歹”与“罗、锅、跼”韵目迥别,而“多”则入韵。句意上,“纵病多”即使疾病增多,语义通晓。
- ④参见罗筱玉《〈新编五代史平话〉成书探源》,《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
- ⑤此处所举碑刻字例,均引自臧克和《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南方日报出版社,2011年,第609-613页)。
- ⑥此所据清张氏泽存堂影印宋本《玉篇》,《四部丛刊初编》景建德周氏藏元刊本《玉篇》作“多改切,角也”,疑“角也”为后增。
- ⑦𐰇与上文所列“歹(歹)”之异体𐰈视觉微殊,实则同形。
- ⑧此处采用宽泛的历史范围,将蒙古时期纳入其中,时代上起元太祖(1206),终至元惠宗(1368)。
- ⑨文中所列举元代碑刻及字形均引自邹虎《元代碑刻辑释》(凤凰出版社,2022年),不一一出注。《元代碑刻辑释》收录国内所见元代碑拓凡755种。
- ⑩关于“歹亦真”与“歹”的关系,后有详细讨论,此处从略。

⑪ 此五例并引自乌兰《元朝秘史(校勘本)》(中华书局,2012年)。

⑫ 根据清格尔泰(1985:70),契丹语中存在 d/t 不分的现象。

参考文献:

- 保朝鲁 2002《汉译简编穆卡迪玛特蒙古语词典》,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方龄贵 2004《元史丛考》,北京:民族出版社。
- 傅林 2013《契丹语和辽代汉语及其接触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哈斯其木格 2024《蒙古语二合元音的形成与演变》,《民族语文》第6期。
- 黄征、张涌泉 1997《敦煌变文校注》,北京:中华书局。
- 黄征 2005《敦煌俗字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蒋冀骋 2005《敦煌文献研究》,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焦其戴·吉仁尼格 1987《蒙古语名词的单数形式》,《民族语文》第2期。
- 凯琳 2022《现行蒙古语标准书面语名词构词形态及其语音结构类型》,《民族语文》第5期。
- 李荣 2002《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 李思纯 1957《江村十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刘坚 2005《近代汉语读本》,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罗筱玉 2012《〈新编五代史平话〉成书探源》,《文学遗产》第6期。
-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研究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1999《蒙汉词典》(增订本),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齐木德道尔吉 2002《从原蒙古语到契丹语》,《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期。
- 清格尔泰 1991《蒙古语语法》,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清格尔泰、吴英喆、吉如何 2017《契丹小字再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 清格尔泰等 1985《契丹小字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裘锡圭 2013《文字学概要》(修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
- 任中敏主编 2014《敦煌歌辞总编》,南京:凤凰出版社。
- 日本京都帝国大学藏版 1998《元刊古今杂剧三十种》,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 孙竹 1990《蒙古语族语言词典》,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
- 孙伯君、聂鸿音 2008《契丹语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乌兰校勘 2012《元朝秘史》,北京:中华书局。
- 徐复 1990《徐复语言文字学丛稿》,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 徐时仪 1993《“歹”字演变探微》,《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第4期。
- 徐文堪 1993《〈语文学论集〉读后》,《中国语文》第1期。
- 杨琳 2010《古汉语外来词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南开语言学报》第1期。
- 臧克和主编 2011《汉魏六朝隋唐五代字形表》,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
- 邹虎 2022《元代碑刻辑释》,南京:凤凰出版社。
- [波兰]W.科特维奇著,哈斯译 2003《阿尔泰诸语言研究》俄文版序言,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 [波斯]拉施特著,余大均、周建奇译 1983《史集》第1卷第2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 Ferdinand D Lessing. 1960. *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作者简介】邹虎,男,湖北荆州人,南京林业大学人文院讲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字发展史及碑刻文献整理研究。邮箱:zouhu1111@163.com。

【责任校对:余月】

1160, 1457, 2220, and 2401, providing a thorough interpretation of the slip texts, particularly noting how slip 1457 illuminates the relationship among the scribe, the model used for copying, and the stylistic expression.

Key Words: Dunhuang Han bamboo slips; cursive script; folk-style poetry; model for copying

WEI Qi-jun, WANG Guo-xu, Textual Research and Discrimination on the Cursive Script Characters of Dunhuang Manuscript S.6888

Abstract: Dunhuang cursive manuscript S.6888 is an exceptionally valuable Buddhist document among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The accurate decipherment of its cursive script is the essential prerequisite for understanding its significance in Buddhist history, social history, and the history of calligraphy. Building upon the foundation of prior research, this paper focuses on ten key groups of easily confused characters within the S.6888 manuscript, namely *jike* (极格), *yan* (颜), *sheng* (生), *fa* (法), *shuang* (双), *ao* (傲), *ji/zhu* (极、注), *fei/guang/yi* (飞、光、意), *pu/hou/shi/ji* (幞、后、使、寄), and *liang/xiao* (亮、小). By systematically applying the “fourfold evidence methodology”—comprising 1) graphical component analysis, 2) contextual semantic inference, 3) corroboration with internal and contemporary parallel examples, and 4) verification against parallel texts from the Buddhist canon—the paper conducts a meticulous examination of these characters.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e typical patterns of character confusion inherent in Dunhuang cursive script. These patterns arise from factors such as the omission, combination, and ligatures of character components, the simplification and convergence of specific radicals, the interplay of variant character forms and homographic shapes, and the distinctive writing conventions of Buddhist terminology.

Key Words: Dunhuang manuscripts scrolls; cursive script; textual research and discrimination

ZOU Hu, Tracing the Origin and Evolution of the Chinese Character Dai (歹)

Abstract: The character Dai (歹) frequently appears in early modern Chinese texts, typically carrying the meaning of “bad” or “evil.” Scholarly discussions on Dai (歹) have yielded numerous insights. Regarding its origin, it is generally believed to have emerged from colloquial speech. However, debates persist concerning its historical period of emergence, the evolution of its written form, and its etymological roots, due to insufficient evidence. Synthesizing existing scholarship, there is consensus that Dai (歹) likely originated during the Song-Yuan transitional period. Addressing the question of its graphic derivation, this study adopts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Chinese character development. Through analysis of excavated textual forms and graphic correlations, it identifies Dai (歹)’s earliest form as “𠂔” and revises the previously proposed hypothesis of Tibetan origins. In exploring the phonetic and semantic aspects of Dai (歹), the paper employs a language-contact framework, arguing that its sound and meaning derive from Khitan linguistic influences while ultimately tracing its etymological source to the Chinese lexical item Di (敌). The phonetic evolution is reconstructed as *diə? > *dia > *dayi > dǎi. As for the graphic origin of “𠂔”, analysis of orthographic features and comparative character forms suggests potential connections with the Khitan small script.

Key Words: Dai (歹); era; form; the sound and meaning